



温故

温故

十二

主编 刘瑞琳

- | | |
|-----|-------------|
| 白先勇 | 战后东北之争「下」 |
| 简 杨 | 秋日寻谭 |
| 蔡晓滨 | 遥望科德角 |
| 古远清 | 胡兰成在台湾的传奇 |
| 高 信 | 商州故人（二章） |
| 贺宝善 | 我的外公齐如山 |
| 徐大毛 | 我遥远的赣州童年 |
| 李 伟 | 三遇许闻天 |
| 李光谟 |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
| 苗振亚 |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故(十二)/刘瑞琳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8

ISBN 978-7-5633-7644-5

I. 温… II. 刘… III. 中国—现代史—史料
IV.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688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10 字数:150千字

2008年8月第1版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12 000 定价: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渭水 十一 目录

特稿

白先勇 战后东北之笔(下)

风物

简 杨 秋日寻潭 / 22

罗朝晖 千年王村 / 31

回眸

蔡晓滨 遥望科德角 / 36

人物

古远清 胡兰成在台湾的传奇 / 46

高 信 商州故人(二章) / 65

记忆

贺宝善 我的外公齐如山 / 74

- 徐大毛 我遥远的赣州童年 / 89
黄且圆 跟孟昭英伯伯学英语 / 97

印象

- 李 伟 三遇许闻天 / 105
马 嘶 艾青主持的一次批判会 / 114
周绍昌 “痴者”黄继中 / 118
赵 纲 幼年印象中的童书业先生 / 125

口述

- 李光谟 口述 陈 远 整理 李济去台湾的前前后后 / 129

文本

- 周允中 冒舒湮给周楞伽的几封通信 / 136

片语

- 苗振亚 胡适：他是谁的“帮凶” / 148

补遗

- 贺捷新 也说“新疆俄专” / 156

影像

- 王玉龙 美国印第安人的昔日肖像 / 中插

战后东北之争（下）

白先勇

一项改变历史的军事命令——第二次停战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痛定思痛，开始检讨大陆失败的原因。军事方面，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提出在大陆与共军作战所犯的错误。⁷⁶蒋中正本人也终于在他撰写的《苏俄在中国》中对他在1946年6月6日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对东北战争的影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就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当时已进至双城附近之追击部队（距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⁷⁷

蒋中正在这里把最后国军在东北失败，四十七万精锐尽丧敌手，完全归咎于他自己颁发的那道第二次停战令，这是很严重的说法。蒋氏这段检讨相当坦率而沉痛，这在蒋氏言论中，并不多见。如此重大而牵动全局的一项决定，蒋氏当时到底是在何种客观状况及主观心态下而做成的呢？这个问题值得仔细研究推敲。

首先是蒋中正究竟是在何时下决心命令国军先锋部队停止追击的。1946年5月23日，蒋中正偕我父亲等人飞莅沈阳，当天国军正进占长春，蒋氏到东北，亲

眼看到国军士气如虹，并得知林彪部队溃不成军，而且苏联态度又有改变，信心大增。如果他在南京时对国军是否应该进军长春继续往北推进有所疑虑，此刻他已没有顾忌了。5月25日，他在日记中如此记载：

“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⁷⁸

可见这时蒋对哈尔滨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认识十分清楚，而且有决心要命令杜聿明部队往哈尔滨挺进占领。一直到5月30日蒋离开长春飞往北平，其间即使他心中已经开始考虑何时下停战令的问题，显然也并未告诉我父亲或杜聿明等人，否则我父亲及杜聿明在沈阳或长春一定会向蒋力争继续北进占领哈尔滨了。事实上5月30日这一天，蒋还接到行政院长宋子文的“陷电”：

“文今晨携钧座函译文及三妹函交马使，谈二小时，马谓钧座意甚恳切，可希望作为解决之根据，渠即将召周恩来谈，告以渠之意见。(一)交通即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外，无法调停……”⁷⁹

可见马歇尔也同意蒋的看法，共军应退出哈尔滨及齐齐哈尔。按理说蒋中正下令国军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更加有理可据了。不过马歇尔的意思是要由他本人与周恩来谈判来达成共军撤出哈、齐，这说明至少他也承认了共军占领哈、齐是不合法的。

可是就在飞返南京的前一天，6月2日，蒋中正在北平突然下令停战。⁸⁰虽然停战令6月6日才正式宣布，但6月2日显然已经通知东北行营。蒋氏在这短短两三天内独排众议，不采纳东北杜聿明诸将领以及我父亲的建议，进攻哈尔滨，而做出此一重大决定。尤可异者，蒋氏不待返南京后，与他最亲信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开会商议，远在北平便独断决定下令停战，而且返南京后第二天即6月4日，马上径自向马歇尔宣布6月6日起主动停战十五天。到底是何种原因促使蒋中正仓猝间做出如此影响大局的停战决定？

多年来，国民党官方的说法，以及蒋中正本人记载的言论显示，1946年6月

6日蒋中正宣布这道第二次停战令，是由于马歇尔特使的压力。有的美国学者也倾向这种看法。⁸¹马歇尔对蒋中正所施的压力的确很大，三番四次威胁要退出调停切断美援。为了安抚马歇尔而下令停战，这是原因之一。

1946年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至4月18日才重回中国。这期间，因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共军乘机进占中长线上沈阳以北的诸大城市，东北国共两军的冲突乃日趋尖锐。马歇尔抵达重庆当天，4月18日，共军打入长春。马歇尔见东北战事扩大，大为震惊。因此，他返华第一要务便是要调停东北战争，将他惨淡经营而成的1月10日第一次停战令，扩展到东北。但当时共军处处占上风，接着又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周恩来在谈判桌上姿态甚高，马歇尔虽然明知共军进占长春属违反停战协定，但马与周交涉共方撤军，迄无结果。他唯一能使劲的地方，便是向蒋中正施压，要国军让步。4月23日，蒋氏与马歇尔会谈后，在日记中记载：“马歇尔氏于谈话中，全用压力，意在迫使我政府对东北问题再作让步。”⁸²马歇尔咄咄逼人之势，蒋氏深有所感，但当时“四平街会战”已进行得如火如荼，蒋早已布署停当，要与共军一决胜负，当然不可能一时屈服于马歇尔的要求。马甚感不耐，翌日与蒋再会面，对中央政府党政军的种种不是，竟肆意攻击起来，“声色俱厉”，蒋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得“宽予容忍，不与计较”。当初马歇尔使华，主要任务之一即是处理东北危机，而今东北苏联红军撤出后，情况反而恶化，国共军队大打出手，马歇尔个人声誉固然大受打击，而东北战争，可能引发国共全面内战，更教马歇尔心急如焚。他不顾一切，频频向蒋中正施压，以致言辞失礼，正也显示他夹在国共之间，调停一筹莫展，内心挫败之深。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往沈阳，他离开南京前告诉马歇尔：政府已有三日未接到东北军事长官之报告，国军或已向长春挺进，他亲自前往沈阳，以控该地局势。这当然是托辞，父亲19日返南京已向蒋氏报告东北战况详情了。蒋于5月25日给宋子文函中，承认他之所以来沈阳，就是要避开马歇尔的纠缠。⁸³但马歇尔并没有放松，一直电蒋催逼他下令国军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停止前进攻击”。此时中共四平兵败，乃发动宣传猛烈攻击马歇尔包庇国民党，扩大东北战事，中共目的当然在促使马歇尔逼蒋停战。马歇尔这时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辩，尤其蒋飞沈阳，乘的是马歇尔座机，于是中共更有借口攻击蒋赴东北督战系出于马歇尔的

指使。马歇尔大为窘迫，被逼得上无线电广播，公开呼吁蒋中正下令停战，以便撇清中共对他的指控。5月31日，蒋中正已到达北平，马歇尔还追电过去：

“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⁸⁴

马歇尔此刻已显得气急败坏，语近威胁，有意退出调停了。6月4日，当蒋中正返南京会见马歇尔，告之决定6月6日颁布停战令时，马歇尔欣喜之情，可以想见，很可能他会认为，他向蒋中正不断施压，终于奏效。

那么，蒋中正果真是完全屈服于马歇尔压力而颁发第二次停战令的吗？恐怕也并不尽然。

首先，马歇尔来华调停之初，汲汲于催促蒋中正与中共组织联合政府，又于1946年1月10日达成第一次停战协定，在蒋看来，马歇尔所作所为皆有利于中共，对国民党政府则为害甚烈。因此，一开始，蒋中正对马歇尔来华调停，便有所排拒，心生警惕。他在日记中，对马歇尔的批评，坦率、中肯，对马歇尔调停所产生的害处认识得也很清楚。早在1946年1月22日的日记中，蒋对马歇尔便这样批评：

“彼对我国内情形及‘中共’阴谋并无了解，终将误大事也。”

他审阅了马所提“临时政府组织法”后，感慨道：“此为‘共党’所不敢提者，可知客卿对他国政治之隔阂。若本自无定见，不仅误事，且足以召亡国之祸也。”⁸⁵

蒋甚且认为，听从马歇尔会召来“亡国之祸”，所以自我警惕，要有“定见”，这是很重的话。第二天开“政协会议”，蒋看见马歇尔被中共周恩来、民盟罗隆基等人包围，对中国国情又“隔阂异甚”，蒋担心“甚有重演前年史迪威不幸事件之可能”，不禁“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史迪威是马歇尔的老部下，甚得马器重，“史迪威事件”后，马歇尔对蒋中正难免不生成见。他到中国后，蒋看见他言行之间，竟处处偏向中共，与史迪威当年同出一辙，难怪蒋“忧心悄悄”，生怕“史迪威事件”重演，损害中美关系。在蒋看来，马歇尔专以妥协中共为能事，

简直“完全为‘共党’宣传所迷惑矣”。蒋的说法，也不无道理，3月初，马歇尔竟亲自跑到延安去巡视，受到中共盛大欢迎，毛泽东见机向马歇尔建言：“解决国共军事冲突之关键，端在美国立即停止对华军事援助。”⁸⁶后来，马歇尔果然切断对国军军援八个月之久。

马歇尔返美国述职后回重庆，当时东北国共两军已经打得不可开交，马歇尔仍主张对中共采取妥协。蒋中正认为马“只求暂时不发生战争，即视为调停成功，而于我国之实际利害成败，则毫未计及”，乃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马歇尔毫不为所动，两天后即4月21日，竟呈送蒋备忘录一份，拟以美军装备供给共军十个师，马认为，这样美国军官得以训练中共部队，以利国共两军之整编。幸亏马歇尔这个打算魏德迈早已悄悄告诉蒋中正了，否则马歇尔这个建议的震惊效应恐怕更加巨大。4月28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他对马歇尔的观察：

“近察马歇尔氏之心理及其态度，乃极以对‘共’交涉之破裂或停顿为虑，时现恐惧与无法应付之情态，其精神几已完全为共党所控制，一惟‘共党’之要求是从，无敢或违，凡与‘共党’心理抵触之条件，皆不敢向‘共’方试谈，其畏‘共’心理，竟至如此！”

这里，蒋氏认为马歇尔已经着了中共的迷，完全被中共牵着鼻子走，失去调停的能力了。而且马歇尔对国军毫无信心，认为国军在东北绝无摧毁共军的能力。“四平街会战”，国军打了大胜仗，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已往北边撤退，可是马歇尔硬是不信，向宋子文表示反对国军进占长春。蒋中正这次真的光了火，5月24日，在沈阳所记的日记中，把马歇尔狠狠地批了一顿：

“马歇尔不问我国之利害祸福如何，亦不顾其国政策之能否实现，而惟以其个人之功利成败是图，一意对‘共党’迁就，以致扬汤止沸，劳而无功。近闻马歇尔向子文表示，对我军进占长春，甚不赞同。此乃其一贯之错误政策，无足为异，此时惟有竭尽吾人之心力，以至诚感之，以促其觉悟耳！”

四平兵败，中共中央震动，为了挽救颓势，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希望停战和谈。5月27日，蒋中正看到马歇尔转来周恩来致马的备忘录，记道：

“周恩来之奸谋狡计，自在意中，而马歇尔氏之心意，亦一如往日，只希望

我立即下令停战，俾其个人任务，得以迅速达成，而不顾我国脉民命之存亡绝续，为可慨也！”

由此可见，蒋对马歇尔充作国共内战调停人之短处之局限，有相当清楚的认识：马歇尔昧于中国国情，迷惑于中共的宣传，对中共一味妥协迁就，只管个人调停得失，置国民党政府存亡于不顾，而且对东北战况根本不清楚。蒋氏并曾自我警惕，听从马歇尔的调停，可能招致亡国之祸。蒋氏既有此等认识，更了解中共战败求和是“奸谋狡计”，而在1946年6月初短短数日，竟会完全屈服于马歇尔的压力，而做出影响东北全局的停战决定，似乎于理不合。试观其后蒋与马的关系，第二次停战令终止以后，关内国共两军，反而大打起来，全面内战开始。蒋不顾马歇尔退出调停的威胁，于当年10月毅然下令进军内蒙重镇张家口，因此触怒马歇尔，切断对国军美援八个月。由此可见，蒋氏指挥国军进退，自有主见，不一定那么容易受马歇尔左右。因此，1946年6月6日蒋中正仓促间颁发第二次停战令，应该还有其他更深刻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在《苏俄在中国》中，特别辟一章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其中有一节是：“我们自信太过……”蒋氏承认由于“自信太过”，“未能对共党问题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的解决”。他举例1927年清党及1934年第五次“围剿”成功，对共党“残余部队，不作最后的追剿，且接受其停战归诚的要求”。在先前检讨“东北变乱与第二次停战令”时，蒋氏自己说明他下第二次停战令的理由：

“综核前方报告，都认为‘共匪’经过此次致命惩创之后，如不受国际特殊的影响，决无再起可能。我亦以为‘共匪’在此创巨深之余，苟有一线爱国良知，果能实践其一月间停战协定等诺言，仍可予其悔过自新，效忠国家另一次之机会，乃先令前方追击部队就地停止待命。”⁸⁷

接着蒋氏沉痛检讨：

“这不仅重蹈过去以为中共亦是中国人，总是爱中国的，终有和平解决可能的这一幻想，所带来无穷灾害的覆辙；而亦就是我在‘检讨反共斗争成败得失’一章中所自述的‘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以及‘我们自信太过……’的弱点，所造成的祸根。”⁸⁸

蒋中正于5月23日飞沈阳后，得到前方报告，发觉共军大败，严重性出他意料之外，他在沈阳那几天亲自指挥国军追击，连连得手，林彪部队溃不成军，往北溃逃。5月24日，他函马歇尔，由宋美龄执笔，提出对中共停战和谈条件，比先前严苛甚多，而且口气强硬，几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败方招降了。因此，蒋中正于6月2日在北平遽然下令停战很可能是基于下面的原因与动机：

蒋中正确实认为共军“经过此次致命重创之后”，“决无再起可能”。他于6月2日返南京前下令国军停止追击，一方面可以安抚马歇尔，缓和美方压力，同时还留了一着活棋，6月7日，在停战令生效的同一天，他电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内附复马歇尔信：“即在东北，国军有行动自由，及政府在东北接收政权，不受阻碍。若共军再有攻击，即予反攻。再共军恐难就范，故仍须准备进攻。”⁸⁹蒋氏显然并不相信共军会遵守停战协定，但同时他却认为，下令停战后，国军仍旧有能力，随时可以再进攻。

事后看来，1946年6月初，东北林彪部队经“四平街会战”兵败，损失惨重，已失去战斗能力，可以说是其在整个东北战争中，最虚弱的一刻，而国军四平大胜，新一军在陆空联合作战的威力下，势如破竹，直追过松花江岸，离哈尔滨不足一百里，也是国军士气最高昂的时分。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军亦最有利，苏联斯大林玩两面外交，看见共军在四平会战中节节败退，已认为东北战争国军一定会赢，乃于5月6日通过蒋经国邀请蒋中正访苏。国军进占长春后，苏联态度转变更大，向国民政府示好，表明不会支援共军了。至于美国方面，亦承认共军进占长春、哈尔滨，是破坏马歇尔促成的停战条约，因此国军师出有名。而且此时关内国共战争还没有全面展开，国军在东北可以集中力量“剿共”。因此，国共两军在东北一决胜负，1946年6月初，是国军占尽优势的关键时刻，这个良机一失，国军便再无赢得东北的可能。

蒋中正当时对东北局势显然作了错误的判断，他没有考虑到骤然下令停战，对国军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如他检讨中白云，由于“自信太过”，对共军产生了轻敌心理，以为林彪部队，“决无再起可能”，乃贸然下令停战。第二次停战令下达的时机，完全违反军事原则。《曹刿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两军对垒，往往是一场比较士气高下、意志力强弱的决战。正当国军一鼓作气，往北挺进，眼看胜利在望，而突遭勒令撤回，对当时将士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从此东北国军士气再衰三竭，以至一蹶不振，就是从这道第二次停战令开始。

毛泽东命令林彪死守四平，犯了严重的军事错误，差点输掉整个东北，但蒋中正下令国军停止追击，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把东北彻底失去了。很可能，国共内战的胜负，在1946年6月初，已经决定。

父亲的憾恨

1956年5月2日，父亲在台湾上书蒋中正一封密函，其中有这样一段：

“抗战胜利后林匪彪窜扰东北得苏俄接济占据东北战略要点——四平街国军久攻不下职奉钧座命令前往四平督师三日而攻克之当时我统帅部曾获谍报苏军约六千潜留长春故密令国军不准渡辽河职当时身临前敌关于匪情比较清楚故本上级指挥官企图曾独断下令严饬杜总司令聿明率部越过辽河追击攻占长春吉林匪所部死伤惨重溃不成军确已失去战斗力若照职原定计划继续穷追本可将其消灭于东北境内以免该匪后来在东北接受苏军缴获日本关东军五十万人之优良装备为我第一劲敌同时我可将东北国军精锐调进关内形成重点使用剿匪军事或可改观无奈马歇尔将军受匪共欺蒙左袒毛匪强迫东北国军停止追击遂使林匪坐大反噬养虎遗患往事追忆真令人痛心疾首者也。”⁹¹

同年12月，蒋中正的《苏俄在中国》出版，这时距“四平街会战”已有十年。蒋中正与父亲，两位“四平街会战”的主事者，在十年后，各自追忆起这一段国共斗争的历史关键，同感“痛心疾首”。蒋氏悔恨当初错下第二次停战令，父亲则痛惜蒋中正未能及时采纳他的建议，彻底消灭东北共军，以致林彪部队坐大反噬。

父亲一向冷静沉着，喜怒轻易不形于色，但不止一次，我亲眼看到他晚年在台湾，每提起这一段往事时，犹自扼腕顿足，憾恨之情，溢于言表。我很少看见父亲论事如此激动，即使论到“徐蚌会战”——另一个与他纠葛甚深的战役，他也没有像谈到“四平街会战”时如此痛心惋惜。“四平街会战”，最终竟功亏一篑，



1952年1月，国民党主要军事首长在台北县林口校阅军队，由左至右为何应钦、白崇禧、孙立人、陈诚。

一着棋错，满盘皆输，这是父亲一直耿耿于怀，到他晚年亦常引以为憾的一件恨事。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替父亲做口述历史访问，从1963年起，共访问了一百二十八次，共五十二万言，可惜还未及谈到国共内战，1966年，父亲遽然逝世。因此，来不及论到1946年的“四平街会战”，但即使如此，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竟有四处提到这一个他始终未能释怀的战役。

综观父亲有关“四平街会战”的言论，可以归纳成几个要点：

(一)父亲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首败在军事，而军事失败，又以“四平街会战”没有彻底剿灭共军，而让林彪部队坐大反噬，“养虎遗患”，最为关键。在

这点上，父亲与蒋中正看法相同，皆认为“四平街会战”功亏一篑，不仅影响东北得失，甚至决定整个内战的胜负。

(二)父亲亦不便点明蒋中正下停战令之错误，而归咎于马歇尔的压力及其对中共认识不清。但父亲接着说：“当然我们在大陆之失败不能怪人，不能怨人，靠人家总是不行的。”言下之意，也认为蒋当初不应过分依靠美国，受马歇尔左右。父亲曾向蒋建议，如马歇尔责怪，可以将继续追击的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三)父亲一再向蒋中正请命，让他留在东北，完成彻底剿灭林彪部队的计划，蒋始终不许，强令父亲返南京。所以父亲反复说蒋主席“硬”、“一定”要他回南京就任国防部部长。父亲大概对这件事始终是耿耿于怀的。

(四)父亲不仅力主乘胜追击林彪溃败部队，攻下哈尔滨、佳木斯、满洲里等北满主要城市，父亲更建议清除东北共军后，马上组织三百万民团以巩固确保地方治安，再抽调五个美式械备师，到关内帮助北平行营在华北“剿共”。

(五)父亲往东北督战，四平街攻下后，父亲下令继续进攻长春，杜聿明出示中央命令，因得密报长春潜伏有六千苏联红军，令国军不准越过辽河。父亲判断林彪部队已经溃败，应乘胜追击，乃独断下令，严飭杜聿明继续追击，往长春挺进，并连夜飞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事情经过。这一段史实，在杜聿明的回忆《国民党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一文中，并没有记载，读杜文，令人得到的印象是四平街攻下后，杜聿明要下令进攻长春，反而是父亲迟疑不决，杜极力说服父亲，父亲才同意追击。我记得父亲对当时的情况曾有这样说法：他的确三番四次询问杜聿明，国军是否有把握攻下长春，当杜保证有把握后，父亲乃下令进攻，并对杜说，在南京中央方面，由他去负责。杜文中完全没有提六千苏联红军潜伏长春，中央下令国军不可越过辽河之事。既然父亲于1956年上呈蒋中正的密函中，郑重提起这段历史，尤其突出他“独断下令”的事实，蒋应完全了解当初情形，当以父亲的说法可信。杜聿明的回忆文章是被俘后在大陆所写的，他隐去这一段，而且颠倒了一些事实，可能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但对杜聿明这篇文章，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多所引用，所以应该澄清其错误的地方。事实上当初父亲见机独断下令追击，十分重要，因此国军攻克四平后，才得以马上继续追击，在公主岭赶

上林彪部队，将之击散。对中央的命令，杜聿明不敢违抗，但父亲是蒋中正特派到东北督战的大员，才有独断行事的可能。

父亲于5月19日连夜返南京向蒋中正报告四平街战况后，便于5月23日急着赶回东北。父亲在“访问记录”所载，似乎是蒋临时起意要与父亲一同赴沈阳的，但既有宋美龄、张嘉璈等人偕往，可见蒋在那两三日内已经决定要亲自赴东北主持大计的了。他曾在给宋子文的函中说过，他去东北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避开马歇尔逼他停战的压力。事实上他赴东北亲自指挥国军追击，反而更坐实马歇尔说他有意拖延停战的指责。其实当初的上策应该是，既然父亲往东北督战已获大胜，理该再让父亲独自重返沈阳继续主持国军北进攻击计划，蒋自己留在南京与马歇尔周旋，试观日后蒋能让马歇尔八上庐山，为了调停疲于奔命，他在南京再应付马歇尔两三个星期，应该不成问题，正如父亲所提，可以将责任推到他的身上。蒋与我父亲同赴沈阳后，父亲又数度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完成肃清共军的任务，如果蒋允许父亲所求，东北的情况应该完全不同。

苏联撤军后，在“四平街会战”国共双方展开主力大战，东北的问题已由国际外交转成以军事为主了。这时，东北的军事主持人地位日显重要。持平而论，杜聿明在国军将领中，算是相当杰出的一位将领，后来因为东北战争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没，而遭到各种攻击，且被美国人在“白皮书”中斥为“庸将”，但他的老上司关麟征说了公道话，他称赞杜聿明精明强干，“论学术能力，均不失为是一个好将领”。但他也认为杜作战经验不足，指挥大兵团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尤其不足：“一个只能挑一百斤的人，却要他去挑一千斤，这又焉能不垮不倒？”⁹²中共方面既然打出共军中第一张王牌林彪来，国军也应该推出一位与林彪旗鼓相当的将领与之对抗。而且杜聿明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因派系不同（熊为政学系），意见相左，杜时时受制于熊。如果父亲能留在东北主持军事大计，这些都不成问题了。父亲是国防部部长，职位高于熊式辉，而且北伐时，父亲任东部军前敌总指挥，指挥过熊。如果让父亲坐镇东北，指挥杜聿明下面廖耀湘、陈明仁、孙立人这些国军中的虎将，以当时国军之气势及军备优势，“将林部歼灭或驱出东北境外”的可能性极大。

军事平定后，父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治理东北的计划，那就是：“编三百万

民团，自动保卫地方。”父亲本来就反对战后贸然裁军，尤其反对解散各地方游击队及伪满军。父亲这项组织民团的计划，一定会将东北地区的游击部队及伪满军统统收编。后来陈诚下令解散东北三十万伪军，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投到林彪部下，共军如虎添翼，是后来共军在东北得胜的主要因素之一。父亲在30年代治理广西时，便以训练广西民团著名。父亲又当过八年军训部部长，练兵有丰富经验。如果让父亲在东北组织训练一支三百万的民团，这些民兵深入东北各地农村，保卫地方，对付共产党的游击队，将是一股劲敌。而且共军干部下乡展开土改，组织农民，也将遭遇这些民兵的抵抗。父亲计划中的三百万的民团，将是稳定东北的一股重要力量。后来东北国军渐渐被孤立，最后困守在几个大城，被共军包围吃掉，就是因为国民党在东北的行政系统未能够组织动员东北人民，辅助国军。军事与行政系统，各行其事，不能相辅相成。父亲建议组织民团，是颇有远见的一项计划。

父亲下一步计划是，东北情况稳定后，抽调五个美械装备师，重点使用，入关帮助北平行营打华北聂荣臻部下的共军，父亲认为，如此“戡乱大局或可改观”。

当然，这一切假设端看蒋中正当时是否愿意让父亲留在东北主持大计，而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有这样的看法：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即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蒋先生何以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忌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

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⁹³

李宗仁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可能有偏颇，论述细节也有错误的地方，但他认为蒋中正对父亲有所顾忌，不愿意授权父亲在东北主掌大局，是极有可能的。这又牵涉蒋氏与父亲多年来一贯错综复杂的关系模式了。蒋氏相信父亲的军事才能，所以才会派他去东北督战，处理危机，但一旦父亲在东北指挥蒋氏最心爱的黄埔系王牌军得心应手，打了大胜仗后，还想留下来，总揽东北大权，这恐怕就不是蒋氏心甘情愿的了。蒋极重视东北，所以才会派他至为亲信但才能胆识皆属平庸的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营主任，对他忠贞不贰的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杜等人对蒋自然言从计听，不敢有所违抗。而父亲就不那么好驾驭了。父亲“独断下令”进军长春，是有违中央蒋中正的命令的。父亲返南京向蒋报告下令进军长春这件事时，蒋“当场不置可否”，“很沉重的样子”，“‘唔！’‘唔！’连声”，蒋这些反应似乎有点不悦，他对父亲一向敢作敢为的独断作风，恐怕并不很欣赏。蒋不放心让我父亲一个人回转东北去继续指挥，所以才与我父亲同往沈阳，而且将指挥军队的大权拿了过来，亲自指挥国军北进。由父亲的“访问记录”中看来，父亲自与蒋中正同赴东北后，东北的军事大计，他似乎就无权做主了。父亲在长春向蒋请命，希望留在东北，继续指挥国军北进，蒋吩咐父亲：“6月1日国防部成立，你回去接事。你的意思，我交代杜聿明去做。”蒋的言外之意是否在告诉父亲：东北的军事已有杜聿明负责，不必你越俎代庖了。

1947年夏秋之交，林彪部队早已坐大反噬采取攻势，几度南下攻打四平、吉林、长春，东北国共双方形势优劣逆转，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下，势在必撤。蒋中正一度有意要李宗仁兼任东北行辕主任，因李宗仁先前曾向蒋请假赴美就医，当时蒋的方案是：李宗仁调任后，先派父亲代理东北行辕主任两个月，以便李赴美就医。李宗仁以东北形势仍照当时办法甚难挽回，固辞不就，因而改派参谋总长陈诚就任。⁹⁴当时蒋中正一定已经看出当初没有接纳我父亲的请求，让我父亲在东北彻底“剿共”的错误，希望我父亲再度出马挽救东北局面。陈诚上任后，共军一连发动攻势，国军吃了几个大败仗，使吉林、长春、四平街完全陷于孤立。父亲看见东北形势急速恶化，乃向蒋中正建议：应及早放弃吉林、长春，